

知识的交汇与融合^{*}

——批评话语分析、社会符号学以及 新修辞学发展轨迹引发的思考

田海龙

(天津外国语大学语言符号应用传播研究中心,天津 300204)

提 要 考察批评话语分析、社会符号学以及新修辞学关于话语、符号、修辞的认识,分析这些认识发展变化的特征及其在后现代主义语言观上形成的交汇,本文认为这种“交汇”还可以进一步发展,形成跨学科的“融合”,并体现一定的学术创新。基于此,本文对知识交汇与融合的问题进行话语层面的思考,认为批评话语分析、社会符号学以及新修辞学形成知识交汇与融合的前提是其对新的社会历史问题主动作出回应,而其实现融合的方式则可以是各自术语、方法和理论的相互“再情景化”。如此这般的思考和分析,可以为不同传统的学术话语的交融提供借鉴,为学术话语实践创新提供参考。

关键词 批评话语分析 社会符号学 新修辞学 后现代主义语言观 知识的交汇与融合

一、问题的提出

提出知识的交汇与融合这一问题,主要是受到这样几本书的启发,如福柯的《知识考古学》(Foucault 1972),范代克的《话语与知识:社会认知路径》(van Dijk 2014),以及伯恩斯坦的《教育学、符号控制与认同:理论、研究、批判》(Bernstein 2000)。另外,也是因为我从事的批评话语分析研究涉及一些修辞学和符号学的内容,尤其是它们似乎殊途同归的发展轨迹将我的思考集中在知识的交汇与融合这个问题上面。

在《知识考古学》这本书中,福柯(Foucault 1972)有关知识对象话语形成的论述很有启发意义。他认为,“知识对象(object of knowledge)”并非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多种关系的制约下通过话语形成的。例如“轻罪犯”,之所以它能被心理化和病理化并引发一整套知识对象序列,是因为它在精神病话语中启用了确定的关系整体(Foucault 1972: 43)。换言之,人们在医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及其与国际学术话语交流策略研究》(项目编号:14BYY07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本文初稿曾以“符号与修辞的话语情结”为题在“符号与修辞”前沿理论工作坊(复旦大学 2008 年 9 月 22 日)作过交流。感谢祝克懿教授的邀请,感谢参会同仁的建设性意见。

疗咨询、医学诊断、治疗限定、法律裁决、司法审讯、家庭标准以及惩罚等方面谈论它的方式以及这些方式之间的关系,形成了“轻罪犯”这一知识对象。与福柯讨论知识对象的话语形成类似,范代克在《话语与知识:社会认知路径》中讨论了“社会知识(social knowledge)”如何得到认可的问题。范代克从“社会认知(social-cognitive)”(参见 van Dijk 2012a)的角度出发,认为社会知识是“在语境、历史、文化三重认知标准保障下某一认知共同体的共同信仰”(van Dijk 2014: 21),并提出知识首先是一种心理表征,是个人经历的事件和情节在记忆中的心智模型(mental model);同时,知识还是被社会认知共同体接受并且体现在话语再现过程中的社会信仰。基于此,范代克认为社会知识绝不仅是“确证的真信念”,而是通过话语形式体现的社会共同体关于知识对象的共同认知。这里,范代克实际上涉及社会知识与社会活动通过社会活动者的语境模型(context model)相互作用的问题,而伯恩斯坦通过观察日常生活中的普通知识(体现在伯恩斯坦说的“横向话语”中)以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特殊知识(体现在伯恩斯坦说的“纵向话语”中),从教育学的角度指出前者在传播过程中呈现自然传播的特征,形成不同领域知识的杂糅,而后者在传播过程中具有机构和等级的特征,实施一种规范功能,可以产生抽象的理论而非跨界知识的杂糅(Bernstein 2000: 155-174)。

这几位学者关于知识、话语及其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的精辟论述,以及其他学者的一些相关研究(如 Fairclough 1992;赵芑 2016),使我形成了一些关于知识的初步认识,包括:(1)知识是人们对事物的一种主观认识,或曰主观感受,这种认识或感受因现实不同而不同,不仅受现实的制约,也受现实的引导;(2)知识需要语言来表达,它存在于代表着一定价值倾向的语言表达方式之中,因而知识存在于话语之中,并在话语中形成;(3)话语中的知识具有动态变化的特征,这种变化一方面表现为知识的形成受社会历史环境的制约,会随着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已形成的知识可以因其被广泛认可和接受而形成霸权(hegemony,参考 Bourdieu 1991),并借此对人们的社会活动产生影响;(4)因此,对某一客体的主观认识因人而异。知识依人的学识和对资料的占有程度的不同而不同,因而也是无止境的。

这些认识促使我在批评话语分析研究领域涉及符号学和修辞学的一些实际研究中进一步思考“知识的交汇与融合”这个问题。也正是在这些具体的案例研究中,对知识的交汇与融合这一命题的认识不断明晰,借助福柯的术语,就是逐步“话语形成”。诚然,符号学涉及中国、美国、法国以及俄罗斯等国家众多的学者和流派(王铭玉等 2013),修辞学也具有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刘亚猛 2008),批评话语分析虽是近半个世纪发展起来的新学,但其涉及的内容也极其丰富(田海龙 2006, 2014; 2016b; 田海龙、赵芑 2017);在这样一篇文章的有限篇幅里论述三者的发展轨迹,并借此讨论知识的交汇与融合问题,实属一件爱莫能助的事情。更何况受个人知识储备的局限,对此也只能望洋兴叹。然而,这并不妨碍将观察的对象限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如将符号学的内容限定在“社会符号学”上面,将修辞学的内容限定在“新修辞学”上面,并在有限的程度内对问题进行必要且初步的探讨。更不妨碍把这个过程呈现在此,以求教各方,深化对此问题的认识。

二、批评话语分析与社会符号学

批评话语分析虽是一个比较新的研究领域,却具有跨学科的研究性质,涉及的内容非常广

泛,在一个具体的研究课题中往往涉及语言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传播学等等。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把它限定在那些发源于欧洲(尤其是英国)、通过对社会活动者的话语实践进行语言学分析来揭示话语与社会辩证关系的研究传统。可替代批评话语分析的名称有批评语言学 and 批评话语研究,批评语言学一般指批评话语分析的初期研究阶段(1979—1989),而批评话语研究则指批评话语分析新的发展阶段(2010 至今)。田海龙(2006,2016b)对这几个研究阶段分别具有的特点作了归纳;同时,在费尔克劳、沃达克(Fairclough and Wodak 2012)和范代克(van Dijk 2012b)持有的关于批评话语分析的学术主张基础上,对批评话语分析的精髓与洞见,以及批评话语研究的理论与概念进行了总结,包括:

1) 批评话语分析注重研究话语的社会功能,研究话语参与社会实践、构建社会事实、社会关系、社会身份的功能性;

2) 批评话语分析注重对话语实践的痕迹(文本)进行语言学分析,通过发现话语实践的话语特征来解读话语与社会的辩证关系;

3) 批评话语分析注重探索连接话语与社会的中介体,并在对这个中介体的认识上提出独特的概念,形成独特的理论;

4) 批评话语分析注重研究当代公共话语变化的新特征,研究话语产生与传播的新特点,与时俱进拓展自身的研究领域。

批评话语分析的这些理念体现在批评话语分析学者的具体研究之中,同时也体现在许多学者的社会符号学研究之中,如克瑞斯(Kress)和霍奇(Hodge),以及范柳文(van Leeuwen)的研究。克瑞斯和霍奇共同出版学术著作《社会符号学》(Hodge and Kress 1988),范柳文也出版《社会符号学导论》(van Leeuwen 2005)。这些学者沿着批评话语分析的传统,将符号的意义生成与解读与社会活动和社会活动者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联系起来,为符号学的研究注入新的学术思想。其他学者,如马秦(Machin 2013)通过论述多模态“符号资源”的概念,也体现出批评话语分析学者与从事社会符号学研究的学者之间的交叉。

这些学者研究内容的交叉,体现出批评话语分析与社会符号学在一定程度上交汇在一起,但是,真正体现这种交汇乃至交融的是二者在学术思想(知识)上的融通。我曾通过讨论福柯的话语理论与巴赫金的语言符号学,说明批评话语分析研究和符号学在后现代主义语言观上的趋同(田海龙 2014b),也曾通过讨论符号意义的赋予与解读说明社会符号学关于意义研究的后现代主义特征(田海龙 2015a)。其中的一些主要观点,以及批评话语分析的一些后现代特征,集中表述如下,借以强调二者的学术思想在后现代思潮上的集结:

1) 批评话语分析和社会符号学对索绪尔的结构主义意义观提出质疑,认为意义不再是社会事实的能指内容,而是社会主体通过话语实践实现彼此的联系,运用符号和话语建构的结果,因而意义是动态变化的,具有不确定的特征;

2) 在这个意义建构的过程中,符号和话语的意义可以由社会主体赋予,因而其意义依处于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体的兴趣和利益而定,权力贯穿于话语实践的全过程,决定符号和话语具有这个而非那个意义。

3) 基于此,批评话语分析和社会符号学都认为符号和话语是权力斗争的一个场所,也是权力斗争的一个内容。不同的社会活动主体都试图通过对符号和话语的控制来实现其自身利益。因而符号和话语成为批评话语分析和社会符号学研究的对象,成为被利用和争夺的“符号资源”(Machin 2013)。

以上批评话语分析和社会符号学在后现代主义语言观方面形成的共识,体现出二者在学术思想上的融通。而对于这种融通,批评话语分析领域的学者也在术语上给予认可。例如,沃达克曾用“符号”这一术语表达她对话语的认识,指出“任何事情都有符号的特征,每个符号都在一个无尽的序列里指另一个符号”(Wodak 1996: 24)。费尔克劳也曾用“符号”这个术语赋予话语以更广泛的内容,将对话语的讨论冠以符号(semiosis)的标题(Fairclough 2003)。至于上面谈及的社会符号学的学者从事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也是这种认可在社会符号学方面的一个佐证。

三、批评话语分析与新修辞学

将批评话语分析与社会符号学的融合投射到对批评话语分析与新修辞学联系观察之中,我们会发现同样的交汇点。依前所示,批评话语分析依然指从批评语言学到批评话语研究的发展(田海龙 2006, 2016b),而新修辞学则具体指以美国修辞学家肯尼斯·博克(Kenneth Burke)为代表的当代西方修辞学研究(博克等 1998)。这两个研究学派虽然在地理位置上分处欧洲和美洲,但其在时间上的交汇却是处于后现代主义形成和发展的 20 世纪后半叶(参见田海龙 2015b, 2018)。如同批评话语分析从后现代主义思潮汲取营养,特别是从福柯、哈贝马斯、葛兰西等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关于话语的论述中发现新的研究课题(参见 Fairclough and Wodak 2012)一样,新修辞学也在后现代主义的背景下提出“人类是修辞动物”的观点。新修辞学摈弃修辞只是演说和写作的附加物的认识,强调修辞是所有人类交往中生来具有的东西。在新修辞学的视野里,修辞的功能不再仅仅是劝说,而是制约人们思想的行为,是交际主体通过修辞过程实现的对身份的话语建构(田海龙 2015b)。这种“修辞即认识”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修辞学与哲学的对立,如普罗泰哥拉的修辞术与柏拉图的辩证术的对立(参见温科学 2006),不仅使修辞学置身于后现代主义的哲学背景之中并从中汲取营养,而且也使修辞学成为哲学关注的对象。正如刘亚猛(2008: 292)所述,“反体制”的后现代主义思想把修辞推向了哲学研究的中心,形成一种继哲学的语言转向之后的“修辞转向”。

新修辞学将当代修辞学从狭义的劝说研究转向广义的对一切话语的研究,因而历来被哲学认为具有绝对性的真理,在新修辞学看来只是相对的、通过修辞的方式被发现的。同时,修辞在新修辞学看来制约着人的思想和行为,影响知识的产生。修辞这种被认为是“主动参与”的行为话语在批评话语分析中产生共鸣,与批评话语分析将话语看作是社会活动者参与社会活动的资源和手段的观点异曲同工。由此,共生于西方后现代主义对结构主义语言观的反叛大潮之中,批评话语分析和新修辞学的许多学术观点交汇在一起。田海龙(2015b)对此有过分析,综合起来包括以下几点:

1) 批评话语分析和新修辞学都具有跨学科的特征。批评话语分析的跨学科特征非常明显,不仅体现在其理论基础方面,而且体现在其研究方法、研究团队和研究课题方面。新修辞学的跨学科特征突出体现在其理论形态来自文学批评、法学、哲学、社会学等非修辞学科但又具有超越某一学科的开阔视野,不以修辞学家自命的杂家(刘亚猛 2008: 292-293)。

2) 批评话语分析和新修辞学都关注政治活动和知识生成等问题。就前者而言,社会生活中的不平等以及种族歧视问题是批评话语分析关注的重点,这也涉及批评话语分析对话语中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的分析。新修辞学对此也有关注。李红满和王哲(2014)对 SSCI 数

据库 2004—2013 年收录的西方修辞学研究论文进行统计,发现“政治”和“权力”等词汇“属高频高中心度的关键词”。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新修辞学和批评话语分析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这种共同关注也体现在一些共同的研究课题上面。如同批评话语分析试图揭示话语在媒体新闻、政治治理、国际关系等问题上的作用一样,新修辞学也致力于通过修辞分析来揭示修辞手段在认识真理和建构知识过程中的作用。

3) 批评话语分析和新修辞学都具有批评性特征。所谓“批评”,意即将话语中隐藏的意识形态意义明朗化,并预示着批评是一种带来社会变革的社会实践(赵芑、田海龙 2008)。批评话语分析对其批评性特征毫不隐讳,公开宣称批评话语分析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对话语的批评性分析揭露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的不平等现象,进而引发社会变革的发生(Fairclough & Wodak 2012: 17)。与此类似,新修辞学提倡的修辞批评亦“试图找出人们在何种场合下为何做某事”(邓志勇 2011: 54),试图通过对论辩双方的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来消除不平等关系的话语暴力,而新修辞学在女性和黑人修辞方面的分析,则体现出新修辞学希望通过学者的学术研究解决社会问题的强烈社会责任意识(邓志勇 2016)。

4) 批评话语分析与新修辞学都注重在研究中对语料进行语言学分析。批评话语分析对隐含在话语实践中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的揭露,以及新修辞学对修辞动机的分析,都十分重视通过对语料的语言学分析实现研究目的。对批评话语分析来说,系统功能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认知语言学都可以提供分析的工具,甚至费尔克劳提倡的侧重分析论证和推理的传统修辞学的分析工具(Fairclough 2014)也可以为批评话语分析所运用。在新修辞学的分析工具中,博克的戏剧五要素分析方法“通过对话语的戏剧性分析找出其背后隐藏的修辞动机”(邓志勇 2011: 168)。

四、话语、符号、修辞的后现代集结

由此可见,跨越多个国度的符号学和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修辞学超越各自的空间和时间距离,在 20 世纪中叶分别以社会符号学和新修辞学的名义,与新兴的批评话语分析交汇在一起。这种交汇是有其时代背景的。20 世纪中叶,人们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对科学思维方法能否被完全应用于解决人类面临的社会和道德问题产生疑问,继而对现代主义推崇的“科学”和“理性”的观念提出质疑,在建筑学、社会学、政治学、语言学及文学批评等多个领域提出对现代主义具有反叛性的思想,形成后现代主义思潮。在语言学领域,后现代主义思想体现在后结构主义上,是对结构主义语言学思想的一种反叛(关于这方面的进一步论述可参见田海龙 2009: 40-50, 2014b),而这种对现代主义智力具有反叛性质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也构成了三者交汇的哲学基础。

关于批评话语分析和社会符号学具有的后现代主义思想特征已有很多论述,这些论述不仅来自从事批评话语分析和社会符号学研究学者自己的表述(前者如 Chouliaraki & Fairclough 1999;后者如 Kress 2001),也来自这两个领域的学者对其进行的独特阐释和解读(前者如辛斌 2016;田海龙 2016a, 2016b;后者如田海龙、潘艳艳 2018)。关于新修辞学的后现代主义特征,也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释。例如,克里斯蒂娃(2013)在论及修辞的对话性、双值性、互文性时,指出这些理论促使其在进行文本分析时把文本视为一个动态过程。她指出,“这促成了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的过渡”。之后,她沿着她的学术思想与弗洛伊德理论相遇产生的

后结构主义路径时,与“符号生成”不同的“象征生成”进行论述,指出“象征生成”包括判断与句子,属于意义领域,它的标志是主体的确立,以及随之产生的对象的确立。这样,克里斯蒂娃在巴赫金的“文本空间”又引入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空间”,进而提出另一种形式的对话: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对话(克里斯蒂娃 2013: 8;祝克懿 2018),实现互文性理论对结构主义的突破。

然而,也有学者认为,修辞学对主体动机的强调并不能完全说明新修辞学的后现代主义特性。例如,李显杰(2004: 99)认为:“虽然新修辞学强调意义产生于(有动机的)交流和具体运用环境(意识态度、‘语境’等)而不是语言本身的观念,与修辞带来意义的不确定性和开放性的后现代思想有某种程度的契合,但后现代主义修辞理论并不欣赏前者对作者(主体性)动机的过分强调和对语法功能与修辞功能所作的一体化描述,以及对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象征’功能的张扬。”这里,李显杰在“新修辞学”的基础上又划分出“后现代修辞理论”,并且认为后者相对于前者更具后现代性。对此,有两个问题需要澄清。首先,李显杰(2004: 97)所说的新修辞学是一个“区别于西方古典修辞学的概括性描述”,指所有打破传统的以“演讲术”为主导、以单向“劝服”为理论基点的旧的修辞学研究。这样,他所指的新修辞学不仅包括上文所特指的伯克的新修辞学,而且还“包含了众多的理论走向和不同主张的理论学说”。在此基础上,他将这些所谓的“新修辞学”区分为“现代修辞学”和“后现代修辞学”就不足为奇了。因此,需要澄清的第二个问题也就不言自明:他的这种区分与上文讨论的新修辞学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并不矛盾;相反,由于这种区分,修辞学发展到 20 世纪中叶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契合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强调和凸显。这可以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后现代主义的修辞视角将修辞(如隐喻)看作是“非理性的反结构”所呈现的“无法调和的意义”,而现代主义的新修辞学描述的“复杂词”的多元意义仍是“模型中的有序分布”。这样,后现代意义上的修辞是无“中心”的,是无法组合成有序结构的自相矛盾的符号;而且,后现代主义修辞学还进一步认为,因为语言总是包含其自身修辞活动的痕迹,并因此对该活动造成破坏,使其失掉特性和效力,所以,究竟是否具有某种确切的含义还是个未知数(李显杰 2004: 99-100)。

2) 后现代主义的修辞学把文学的本质界定为一种“修辞性阅读”,这种具有批评意识的阅读不再把修辞看作是对意义的美化和创造,而是看成对意义的模糊和消解。这样,修辞就不再是作者运用的表达技巧,而是读者瓦解文本的有力武器。因此,现代主义修辞学被认为“推崇修辞的‘模糊性’,打破传统的‘二元对立’模式”,同时,它也“强调修辞作为能指的互设,具有‘形式游戏’和‘自我结构’的‘转义’功能”(李显杰 2004: 100-101)。

由此可见,李显杰(2004)在名义上区分出的后现代修辞理论,实际上进一步凸显了形成于 20 世纪中叶的新修辞学的后现代主义特征。从另一个角度讲,“当新修辞学将研究范围扩大到人类的所有言语和其他非言语的象征行为的时候,当后现代主义把一切看成话语的时候,后现代主义也就变成了新修辞学了”(常昌富 1998: 26-27)。这样,加之学者对批评话语分析和社会符号学后现代主义特征的认识,达成如下的共识已是水到渠成,即关于话语、符号、修辞的研究在 20 世纪中叶交汇在后现代主义关于语言与意义的重新认识上面。这种思想观念的集结,源自不同的研究传统,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年代。这使我们不得不审视其发展的轨迹,思考这三个研究传统(批评话语分析、社会符号学、新修辞学)作为“知识”在其发展过程中所体现的特征。

五、知识的融合及其话语因素

本文开篇曾提到对知识交汇和融合的思考源自相关文献的阅读,也源自作者从事批评话语分析(以及涉及社会符号学和新修辞学)的一些研究。阅读文献可以对这个问题形成一些感性认识,而实际研究则可以将这些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通过以上我们对批评话语分析、社会符号学以及新修辞学发展轨迹的考察,对其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思考,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在引言部分列出的对于“知识”的感性认识,可以试图进一步深化这些认识,以期有望将其上升到理性认识。

纵观批评话语分析、社会符号学以及新修辞学的发展及其在后现代主义语言观上的集结,可以看到这三个研究传统感知时代脉搏的勇气。20 世纪中叶的世界,不再是启蒙时代的世界,也不再仅仅引发现代主义以科学实证的研究范式求真去伪的努力。相反,面对两次世界大战带给人类的灾难,学者们更加关注的不再是“对象由什么构成”,也不再是“对象如何被认识”,而是“对象是如何在语言中被表述和呈现”。如此,西方哲学思想在经历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向之后,再次转向语言论(高玉 2009),不仅催生了批评话语分析,而且也使得符号学研究关注符号意义与社会的关联度进而发展出社会符号学,使得修辞学认识到修辞不仅仅是华丽的词藻而是认识本身,进而进入新修辞学的发展阶段。作为知识,批评话语分析、社会符号学、新修辞学之所以集结在后现代主义语言观的哲学基础之上,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应该是对社会和现实问题的关切。不仅如此,批评话语分析、社会符号学以及新修辞学还将各自对社会新问题的认识表现在各自的学术话语之中,通过各自领域中传承下来的概念和术语表达出来,并通过这种“话语”形成各自具有不同特征的学术流派。

符号学和修辞学回应新的社会历史问题,分别形成社会符号学和新修辞学中的新知识,与批评话语分析一起交汇在后现代主义语言观上面,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话语中的知识具有动态变化的特征的一个方面,即传统知识的发展与更新需要回应新的社会历史问题。然而,知识具有动态变化特征还体现在另一方面,即传统知识在回应历史问题基础上生成的新知识仍然会继续发展变化,经历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由边缘到中心的发展(当然也有可能消亡,这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在这个正向变化过程中,新知识通过话语的再情景化实现彼此之间的融合,并通过发挥规范性的功能起到影响社会的作用。就社会符号学和新修辞学以及批评话语分析而言,由于其学术思想通过学术机构的广泛传播,其学术地位也逐渐成为主导,并在学界产生影响。而且,这三者的学术思想还相互贯通,形成“超学科”(Fairclough 2003)的学术交融,在不失去自我的同时从别的学科汲取营养来发展壮大自己。

从话语的层面考察三者的超学科的学术交融,可以关注的一个要点是各自的术语、研究方法以及理论被“再情景化”(van Leeuwen 2008)和“内化”(Fairclough 2006)在其他学科。例如,在《细致修辞:修辞性演说和文本的话语分析》(Johnstone & Eisenhart 2008)一书中,自认为是修辞学家的学者运用以语言学为基础的话语分析理论和方法,对修辞研究关注的科学技术修辞、日常辩论、媒体话语、公共记忆和集体身份等问题进行研究。这些研究以不同的方式涉及修辞的各种问题,但其方法论却集中体现在以经验型、扎根性和人种志为特点的质性研究上面。在这些研究中,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和方法被应用在修辞研究当中,正如编者在该书前言中所讲,“随着修辞研究的重点由构思精细的公开演讲扩展到即时的私下谈话,修辞学家承认

需要新的方法,其中一些便可在本书中发现。话语分析家同样会发现新的分析工具。……一言以蔽之,这些研究显示修辞研究与话语分析的相互补充和彼此丰富”(艾森哈特、约翰斯通 2014: 41-42)。而且,这种学术话语在内容上的融合需要借助语言的表达(田海龙 2015c),需要将某一特定学术话语体系中的术语、文体、甚至格式体例融入另一个学科话语体系之中,或者彼此使用对方熟悉的术语和表达方式,而不是一味地强调自身学科的特殊性。

体现在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通过话语的再情景化实现相互融合,可以使其从边缘成为中心和主流,并可以产生规范性力量。所谓“再情景化”,指一个文本(包括与之相关的文本成份)从一个情景中移出然后被移入至另一个情景的过程(Bernstein 1990)。这个过程充满了“殖民(colonization)”和“挪用(appropriation)”的角力。但是,被“再情景化”的文本由于受到规约性话语的控制和改造,附着于其上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也随之移动,而且,经过有选择性地“挪用、重建、重新聚焦并关联其他话语,亦形成自己的秩序”(Bernstein 1990: 159),产生的新话语与原来的话语有了根本的区别,一方面表现为新话语具有新的意义,另一方面也体现为新话语包含了新意义以外的其他因素。就上文提到的《细致修辞:修辞性演说和文本的话语分析》而言,话语分析应用在对修辞性演说和文本的分析之中,产生一种基于详细的语言学分析的修辞学研究范式,一旦为修辞学界的学者和学生接受并应用,就可以发挥规范和引领新的修辞学研究的作用。

六、结 语

2012年11月5日至12日,法国著名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在复旦大学做了系列讲座,其核心内容是“制造意义的能力”(克里斯蒂娃 2016: 2)。在她看来,语言学、逻辑学、哲学、符号学等均从各自的路径探照内在经验的神秘大陆,而其中涉及的问题是“意义”与“感知”的产生,以及其中的“建构—结构”(克里斯蒂娃 2016: 3)。她指出,将语言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传统自启蒙时代以来分成了不同的“学科”;而她和其他人一起,“试图重新诠释学科间的界限,勾勒出一种必要的‘跨学科’”(克里斯蒂娃 2016: 2-3)。

在本文结尾之处,读到克里斯蒂娃的这段文字,可以发现她对启蒙时代以来语言学研究从分解成不同的学科到趋于消除学科间界限这段历史的概述与本文的研究惊人的相似。批评话语分析、社会符号学以及新修辞学彼此之间在学科上的不同,由于学者对社会历史发展到20世纪中叶产生的新的社会问题的思考和探索,正在通过后现代主义语言观上的集结趋于消融。不仅如此,批评话语分析、社会符号学以及新修辞学也正在通过话语的再情景化彼此融合,形成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态势。从发展的视角看,知识的动态性和相对性也预示了知识的发展永无止境。然而,这种知识的融合,是一种跨学科的使然,也是一种新的规范力量。

参考文献

- [美]艾森哈特、约翰斯通 2014 话语分析与修辞研究,田海龙译,《当代修辞学》第6期。
- 常昌富 1998 导论:20世纪修辞学概论,出自博克等《当代西方修辞学:演讲与话语批评》,常昌富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邓志勇 2011 《修辞理论与修辞哲学》,学林出版社。
- 邓志勇 2016 新修辞学的体验观——兼论新修辞学与认知语言学的交集,《当代修辞学》第3期。
- 高 玉 2009 《“话语”视角的文学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美]肯尼斯·博克等 1998 《当代西方修辞学:演讲与话语批评》,常昌富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李满红、王 哲 2014 近十年西方修辞学研究领域的新发展——基于 SSCI 的文献计量研究,《当代修辞学》第 6 期。
- 李显杰 2004 从现代到后现代:当代修辞学理论辨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 3 期。
- 刘亚猛 2008 《西方修辞学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田海龙 2006 语篇研究的批评视角——从批评语言学到批评话语分析,《山东外语教学》第 2 期。
- 田海龙 2009 《语篇研究:范畴、视角、方法》,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田海龙 2014a 《批评话语分析:阐释、思考、运用》,南开大学出版社。
- 田海龙 2014b 话语理论与语言符号学——福柯与巴赫金对后现代语言研究的启示,《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第 6 期。
- 田海龙 2015a 符号意义的赋予与解读——社会符号学视角,《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第 6 期。
- 田海龙 2015b 新修辞学的落地与批评话语分析的兴起,《当代修辞学》第 4 期。
- 田海龙 2015c 学术话语的交流与交锋,《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5 期。
- 田海龙 2016a 批评话语分析精髓之再认识——从与批评话语分析相关的三个问题谈起,《外语与外语教学》第 2 期。
- 田海龙 2016b 话语研究的语言学范式——从批评话语分析到批评话语研究,《山东外语教学》第 6 期。
- 田海龙 2018 学术思想与研究路径——新修辞学与批评话语分析的异与同,《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第 5 期。
- 田海龙、潘艳艳 2018 从意义到意图——多模态话语分析到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的新发展,《山东外语教学》第 1 期。
- 田海龙、赵 芃 2017 批评话语分析再思考——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语言与社会关系研究,《当代语言学》第 4 期。
- 王铭玉等 2013 《现代语言符号学》,商务印书馆。
- 温科学 2006 《二十世纪西方修辞学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辛 斌 2016 后现代的文化、知识与语言批评,《外语研究》第 3 期。
- 赵 芃 2016 专家知识的话语建构及其合法化——一档电视节目中药品推广的话语策略分析,《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第 6 期。
- 赵 芃、田海龙 2008 批评性语篇分析之批评:评介与讨论,《南京社会科学》第 8 期。
- [法]朱莉娅·克里斯蒂娃 2013 互文性理论对结构主义的继承与突破,《当代修辞学》第 5 期。
- [法]朱莉娅·克里斯蒂娃 2016 《主体·互文·精神分析——克里斯蒂娃复旦大学演讲集》,祝克懿、黄蓓编译,生活、读书、心知三联书店。
- 祝克懿 2018 心理空间范畴与语言生成机制,《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第 5 期。
- Bernstein, B. 1990 *The Structuring of Pedagogic Discourse*. London: Routledge.
- Bernstein, B. 2000 *Pedagogy, Symbolic Control and Identity: Theory, Research, Critique* (revised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 Bourdieu, P. 1991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London: Polity Press.
- Chouliarakis, L. & N. Fairclough 1999 *Discourse in Late Modernity: Rethinking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Fairclough, N. 1992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Fairclough, N. 2003 *Analysing Discourse: Textual Analysis for Social Research*. London: Routledge.
- Fairclough, N. 2006 *Language and Globalization*. London: Routledge.
- Fairclough, N. 2014 Review of Siobhan Chapman's *Susan Stebbing and the Language of Common Sense. Discourse & Society*, 25(3): 408-411.

- Fairclough, N. & R. Wodak 2012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H. Tian and P. Zhao (ed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Essential Readings*.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16-47.
- Foucault, M. 1972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 Hodge, R. & G. Kress 1988 *Social Semiotic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Johnstone, B. & C. Eisenhart (eds.). 2008 *Rhetoric in Detail: Discourse Analysis of Rhetorical Talk and Text*.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Kress, G. 2001 From Saussure to Critical Sociolinguistics: The Turn Towards a Social View of Language. In M. Wetherell, et. al. (eds.) *Discourse Theory and Practice: A Reader*. London;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29-38.
- Machin, D. 2013 Introduction: What is Multimodal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10 (4): 347-355.
- Van Dijk, T. A. 2012a Critical Context Studies. In H. Tian and P. Zhao (ed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Essential Readings*.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263-295.
- Van Dijk, T. A. 2012b Principle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H. Tian and P. Zhao (ed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Essential Readings*.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48-89.
- Van Dijk, T. A. 2014 *Discourse and Knowledge: A Social-cognitive Approa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Van Leeuwen, T. 2005 *Introducing Social Semiotics*. London: Routledge.
- Van Leeuwen, T. 2008 *Discourse and Practice: A New Tool for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odak, R. 1996 *Disorder of Discourses*. London: Longman.

Convergence of Knowledge: Reflec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es, Social Semiotics and New Rhetoric

Tian Hailo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discourse, semiosis and rhetoric in the fiel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social semiotics and new rhetoric. The discussion is based on the author's research in the relevant fields and focuses on the conceptual development towards the convergence of knowledge on the ground of post-modernist view of language. It argues that the convergence appearing as the three research traditions makes necessary responses to the new historical situation in the mid 20th century, and this convergence can still lead to innovative thoughts through recontextualization of terms, methods and theories within each field. It is hoped that the reflections can provide insight for academic discourse practice in a way in which discourses of different tradition will interdisciplinarily benefit from and converge with each other.

Keyword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social semiotics, new rhetoric, post-modernist view of language, convergence of knowledge